

1936年 12月 17日 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叶扬兵

内容提要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 1936 年 12 月 17 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 西安事变 周恩来 张学良 会谈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应张学良、杨虎城邀请赴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1936 年 12 月 17 日下午乘飞机从肤施(延安)飞抵西安,随即与张学良进行会谈。对于这次会谈,1937 年 2 月 5 日周恩来在与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谈话中曾有所涉及。在 1980 年代前后,3 本研究西安变事的专著也对此作了较多论述。^①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公布,客观上为西安事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有利条件。遗憾的是,一些研究者往往不去仔细考订和认真解读档案资料,相反却过分依赖回忆性史料,以致在许多问题上竟长期以讹传讹。譬如,史学界关于 1936 年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的传统说法就是最典型的事例,而史学界对于 1936 年 12 月 17 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描述也存在类似情况。对于前者,杨奎松已经通过大量档案资料的仔细解读和分析,予以彻底纠正。对于后者,尚无人进行认真考辨^②,故笔者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 史学界关于周恩来与张学良 12 月 17 日会谈的描述

1937 年 2 月 5 日,周恩来在西安与前来采访的著名记者范长江作竟日长谈,较多地谈及西安事变前后情况。会谈后,范长江把谈话的主要内容记载下来并予以发表。其中可能涉及 1936 年

^① 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版)中未沿用传统说法,但也没有着力进行纠正。

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内容如下:

共产党当双十二事变发生时,中央机关还在陕北保安,他们得到事变的消息,许多人最初一秒钟的决定,是感情的报复主义,主张派人入西安,速蒋之死。然而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认为张扬如此做法,殊欠妥当。盖双十二兵变,既非如帝俄时代群众革命之打倒沙皇尼古拉,又非类似滑铁卢(卢)战争之俘虏拿破仑,此仅以一种不光彩不道德之“军事阴谋”,劫持领袖,第一,与中国当前团结御侮的需要相反,第二,构成今日蒋委员长之政治理论,政治组织和一百余万之中央军,仍然健在。则此事之前途,只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对于国内和平统一,将致背道而驰,愈跑愈远。但是既然木已成舟,理论上的问题已经无用,当速谋补救的办法。周恩来系于12月16日由肤施乘张之波音机到西安,既向张陈述释蒋之必要,同时更亲自与羁陕中央要员见面,作各种政治协商。^①

上述周恩来谈话有两个地方明显是不准确的:一是周恩来不是16日而是17日从肤施乘机抵达西安;二是周恩来也没有与扣留在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除蒋介石外)见面和协商。撇开其他内容不说,谈话中可能涉及周恩来与张学良12月17日会谈的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叙述周恩来对于西安事变的看法,认为张杨做法“殊欠妥当”,指责其是“一种不光彩不道德之‘军事阴谋’”;二是周恩来分析了事变的前途,断言其前途“只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与“国内和平统一”背道而驰;三是阐明周恩来对于解决事变的主张,他到西安后,即“向张力陈释蒋之必要”。实际上,只有第三点才是周恩来向张学良陈述的内容。而对于前两点,周恩来只是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分析,但紧接着指出,“既然木已成舟,理论上的问题已经无用,当速谋补救的办法”。这里,周恩来的表述模棱两可,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把自己的看法和分析告诉了张学良,相反倒容易让人产生他未直接向张学良陈述的暗示和联想。

必须指出的是,周恩来的这次谈话,既不是周恩来在中共内部对西安事变进行的坦率剖析,也不是事变后周恩来对于西安事变的超然回忆,而是周恩来通过著名记者范长江采访所做的一次政治宣传。就在周恩来与范长江进行会谈的前一天(即1937年2月4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潼关与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按照蒋介石指定的乙案达成协议,从而结束了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的紧张对峙局面,基本上奠定了国内和平统一的大局。同日,周恩来接到中共代表潘汉年关于蒋介石要周恩来到杭州与蒋晤谈的电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谈话明显有着为即将进行的国共谈判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的意图,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不能完全当真。

遗憾的是,在1980年代前后,3本研究西安事变的著作虽然对周恩来谈话有所修正,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沿用了周恩来谈话的说法,并用回忆性史料和档案加以补充和发挥。

第一,3本论著都叙述了周恩来当面向张学良提出事变是“军事阴谋”的看法。《西安事变简史》的叙述最为简略:“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于对立地位。”^②这种说法,避免采用“军事阴谋”的字眼,但是类似的意思还是隐含其中。《西安事变纪实》则表述为:“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但是蒋介石的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以后被擒的拿破仑;它既非革命(没有群众暴动),又非战胜(蒋的实力原封未动),而是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

^① 范长江:《塞上行》《大公报》馆1937年7月版,见《民国丛书》第3编第70卷,第314—315页。

^② 前引《西安事变简史》第80页。

乘其不备,用军事阴谋的手段把他捉起来。”^①这种叙述则直接点出了“军事阴谋”的字眼,并作了较多的阐释,还尽力淡化了其中的谴责意味。《西安事变纪实》还指出,张学良“对于‘军事阴谋’的字眼感到有点刺耳”。^②《张学良传》则进一步绘声绘色地描述张学良与周恩来对话时的神态变化: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方式却是军事阴谋”,张学良听了有点不高兴,说“我为公不为私,扣蒋介石还算阴谋?”周恩来说明扣蒋是出其不意,他的实力原封未动,而且又和南京处在对立的地位,对蒋介石的处置要极其慎重。张的神色才缓和下来。^③可以看出,这些著作的叙述与周恩来谈话有两点细微的差别:一是剔除了谈话中明显的宣传成分,把“不光彩不道德”、“劫持领袖”等推崇蒋介石和谴责张学良的词句去掉了,但关于“军事阴谋”这一核心内容基本上保留下来;二是它们都明确指出,周恩来当面向张学良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与周恩来谈话中的模棱两可有所不同。

第二,一些论著还叙述了周恩来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一些著作注意到周恩来谈话中带有政治宣传色彩,因而对周恩来断言事变前途“只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的说法加以修正。《西安事变纪实》指出,周恩来分析事变有更好和更坏的前途:更好的前途就是“说服蒋介石,争取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更坏的前途是“宣布蒋介石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最后把他杀了。这样不但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的内战;不但不能抗日,还会给日本侵略者以进一步灭亡中国的道路。”^④《西安事变简史》则也对叙述周恩来对于事变前途进行了类似分析:“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了蒋介石,团结抗日。一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这样,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⑤

第三,3本论著都叙述周恩来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做全国抗日领袖。《西安事变纪实》指出,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争取实现使中国走向更好的前途,现在只能是说服蒋介石,使他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条路,只要他答应我们的这种要求,我们应当把他释放回去,并且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⑥《西安事变简史》也有类似的说法,周恩来提出:“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就是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⑦《张学良传》的表述略有不同,称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主张,即“如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释蒋,和平解决事变”,并指出“要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最好的前途,也是中共的方针”。^⑧这些叙述,显然都是对于周恩来谈话的“力主释蒋”的具体阐释。与周恩来相关谈话相比,这些叙述还增添了“拥护蒋介石做全国抗日领袖”的内容。

根据前述史学界关于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12月17日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界还可以言之凿凿地以此作为中共中央自始即主张和平解决变变的力证。可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初并未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相反一度还采取“除蒋”方针,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周恩来在12月17日就已经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因为周恩来

① 前引《西安事变纪实》第145—146页。

② 前引《西安事变纪实》第150页。

③ 前引《张学良传》第210—211页。

④ 前引《西安事变纪实》第146页。

⑤ 前引《西安事变简史》第80—81页。

⑥ 前引《西安事变纪实》第146页。

⑦ 前引《西安事变简史》第81页。

⑧ 前引《张学良传》第211页。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固然可以根据形势变化而相机行事,但是,他难道可以在重大问题上置中共中央的既定决策于不顾而自作主张吗?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进行深入的再探讨。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进行具体考察,也就是把周恩来与中共中央联系起来考察而不是割裂开来考察,并主要依据当时档案资料进行分析。

二 周恩来向张学良提出过“军事阴谋”的说法吗?

应该承认,对于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确实有过“军事阴谋”的说法。但是,这种看法,并非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1936年12月19日以后才出现的。

在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时,他所了解的中共中央对于西安事变的看法都是完全肯定的,丝毫没有保留。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胡服(刘少奇),称事变为“西安起义”,誉张杨行为“革命行动”。^①13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张学良电中称事变为“义举”、“西安起义”。^②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③他还明确地说:“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试想一下,17日周恩来来到西安时有可能萌生出“军事阴谋”的看法吗?

在19日以后,中共中央才出现关于“军事阴谋”的说法。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该电报开头就指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种看法完全无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片面地强调西安事变的负面影响。对此,中共中央并未完全采纳,但还是受到一定影响。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④中,一方面仍然积极肯定西安事变,认为它是“为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另一方面也指出:“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⑤这说明,中共中央在对西安事变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对其扣蒋方式持有保留意见。不过,21日,毛泽东在向周恩来转发共产国际的指示时,把指示开头的一句话删掉了。因此,当时远在西安的周恩来可能并不知道中共中央的这种新看法。

在中共中央有了“军事阴谋”的看法后,即使周恩来获知这一看法,他也不可能当面把这种看法向张学良指出来。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效的情况下,在万般无奈中毅然发动的,它实际上是被蒋介石逼出来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周恩来当面向张学良指责所谓“军事阴谋”,那么,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张学良心里会有什么感受?作为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无论如何都不会干出这种幼稚的蠢事。实际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向张学良传达意见时,往往都会考虑

① 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98—99页。

② 《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11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1页。

④ 一般认为该电发出的日期是12月19日。但据杨奎松先生考证,该电应形成于12月20日后。参见杨奎松《有关西安事变几则电报内容与时间的考辨》(《党的文献》1991年6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

张学良的感受。譬如,前述12月21日毛泽东在向周恩来转发共产国际指示时,就删掉了开头那句会引起张学良不快的话。

可以看出,周恩来1937年2月5日的谈话用自己的语言阐释了1936年12月19日后中共中央关于“军事阴谋”的说法,他刻意不提西安事变的正面意义,却着力否定和谴责事变方式(即捉蒋),无疑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相关论著虽然已经尽力淡化周恩来谈话的谴责意味,但却进一步错误地把19日后中共中央关于“军事阴谋”的说法说成是17日周恩来当面向张学良陈述的内容。

三 周恩来是如何分析西安事变的前途的?

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对于事变的前途作了较为乐观的估计。尽管中共中央在12月12日就高度警惕“亲日派勾结日本进攻沪宁”^①,也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可能向西安方面发起进攻,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②,但是,中共中央还是对于事变后的形势作出了相当乐观的估计。中共中央不仅期望全国民众和地方实力派纷纷响应张杨的主张,甚至还希望南京政府大部分也能赞助事变。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西安事变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③因此,在事变之初,中共中央一度设想了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理想化方案。此时,中共中央非但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的被扣会引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反而期望蒋介石的部下能够脱离蒋介石的控制,转移到西安方面来。试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17日周恩来会断言西安事变的前途“只有爆发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吗?

同样,《西安事变纪实》和《西安事变简史》所述周恩来关于事变两种前途的分析,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西安事变纪实》和《西安事变简史》在说辞上略有不同,但它们对于事变两种前途的分析则大体相同:一种前途是较好的前途,即说服蒋介石,争取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种是较坏的前途,即蒋介石拒绝谈判,就宣布蒋介石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最后把他杀了,结果必然会引起更大的内战,便利于日本的对华侵略。可以看出,《西安事变纪实》和《西安事变简史》都把事变的两种前途与蒋介石的态度和对蒋介石的处置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对照前述事变之初中共对于事变后的形势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是站不住脚的。其一,事变之初,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标,把希望寄托在全国民众和地方实力派以及南京政府大部都站到西安方面来,丝毫没有指望说服蒋介石,相反还要采取“除蒋”方针。在这种情况下,17日周恩来怎么会把说服蒋介石当成事变的更好的前途呢?其二,事变之初,中共一度采取“除蒋”方针,但并未意识到此举会导致大规模的内战。在此认识下,周恩来怎么可能把中共力图实现的“除蒋”看成事变更坏的前途?

当然,周恩来的谈话以及《西安事变纪实》和《西安事变简史》所述内容也非空穴来风,凭空捏造。

随着事变后局势的发展,中共中央逐渐改变了原来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日益感到局面的复杂性和危险性。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西安事变后局势的两面性:一方面,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

① 前引《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98页。

② 前引《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21页。

③ 前引《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21页。

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另一方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他还明确地指出,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①张闻天也分析了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②

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更明确指出事变发展有两个前途:“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③

从前述毛泽东、张闻天以及中共中央在对于事变两种前途的分析来看,都没有特别强调蒋介石因素对于事变前途的影响。

不难看出,周恩来谈话,实际上是基于政治宣传的考虑而刻意选取和突出了19日后中共对于事变两种前途分析的一个侧面。而《西安事变纪实》和《西安事变简史》则把19日后中共对于事变两种前途的分析进行了某种改造,突出了蒋介石因素对于事变两种前途的影响,并把它错误地移植到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谈话中去。

四 周恩来主张“释蒋”和“拥蒋”吗?

笔者承认,周恩来后来的确主张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拥护蒋介石做全国抗日领袖。但是,周恩来在12月17日还不可能有这种想法和表示。

第一,“释蒋”和“拥蒋”不符合事变初期中共对于事变的应对方案。

事变之初,中共中央设想了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理想化方案,即揭露蒋介石的罪恶,消除蒋介石的政治影响,积极争取全国民众和地方实力派支持和响应张杨,并争取南京政府大部分转移到西安方面来,从而实现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局面。这一方案的实质则是不想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抗日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当然更不会拥护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日领袖。

中共中央之所以设想了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理想化方案,一方面是以张杨发动事变之举能够获得全国民众和地方实力派的纷纷支持和响应,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蒋介石被扣情况下把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进行切割处理,区别对待,即揭露蒋介石的罪恶,消除蒋介石的政治影响,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蒋介石,但同时又尽量不与南京政府对立,争取南京政府大部分转移到西安方面来。

尽管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并不想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是,又要争取南京政府大部分转移到西安方面来。为此,周恩来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个重要的策略,即“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这一策略也获得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赞同。为了避免与南京政府在政治上的对立,中共中央在许多具体做法上煞费苦心。如13日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均不主张在西安建立名义上政府,分别提出在西安建立抗日援绥委员会或抗日救国会作为全国抗日的领导机构,张闻天则提出要争取南京正统,其用意都在于避免与南京政府对立。

在事变之初,中共中央采取了“除蒋”方针,即“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2月12日,毛

① 前引《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25页。

②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8页。

③ 前引《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4—165页。

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提醒张要把蒋介石押在其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并建议“紧急之时诛之为上”。^①中共中央12日致胡服电、红军将领15日致南京政府电，均提出了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或裁判字样。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13日载文也明确提出“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事变之初，周恩来在保安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他无疑非常清楚中共中央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设想，他也极其明白中共中央的“除蒋”方针。因此，周恩来不太可能在17日向张学良提出释放蒋介石，更不太可能表示拥护蒋做全国抗日领袖。

当然，随着事变后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全国民众和地方实力派纷纷支持和响应张杨主张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相反还出现了持续高涨的“拥蒋”潮流。南京政府一致强烈要求释放蒋介石，并未出现任何分化和转移到西安方面来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南京政府还调集大军大举向西安进逼，与西安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紧张的对峙。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其决策。19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政府和西安张杨，向宁陕双方提出了双方军队停止进攻、在南京召集和平会议等4点建议。该电主张在南京召集和平会议，会议地址又选在南京，显示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设想，转而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承认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19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前“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②，中共中央19日通电也改称蒋介石为“先生”^③，由此中共中央才真正放弃了“除蒋”方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要求周恩来与张杨在6项条件基础上与蒋介石、陈诚进行谈判，并明确表示：在6项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至此，中共中央才非常明确地提出“释蒋”和“拥蒋”。^④

第二，周恩来在12月17日向中共中央汇报中丝毫未谈及“释蒋”和“拥蒋”。

前面我们从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对于事变应变方案分析了17日周恩来不太可能提出“释蒋”和“拥蒋”，这属于间接论证。那么，周恩来还有没有提出“释蒋”和“拥蒋”的可能呢？仔细分析起来，只有两种情况下才有这种可能：一是有重大事件发生使周恩来到西安后对事变应变方案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在张学良提出“释蒋”和“拥蒋”后，周恩来只能尊重张学良的意愿，就对张的主张有所附和。笔者认为，在周恩来从保安到西安期间并未发生足以促使周恩来改变其原来方案的重大事件，因此，第一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但是，张学良有没有提出“释蒋”和“拥蒋”则很难断定，因此，也就不能排除第二种情况的存在。这样，我们就不能完全排除周恩来提出“释蒋”和“拥蒋”的可能，还必须找到周恩来未提出“释蒋”和“拥蒋”的更为直接而有力的证据。

恰好，周恩来在17日与张学良会谈后随即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了当日周张会谈的情况，这为我们了解周张会谈情况提供了最权威的、最直接的证据。我们不妨来具体看一看周恩来的汇报。^⑤

周恩来的汇报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部分。在甲部分，周恩来首先简要地报告他抵西安后的活动情况。

在乙部分，周恩来在汇报中有两处谈到蒋介石问题。周指出，张学良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

① 前引《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97页。

② 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1188页。

③ 前引《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208页。

④ 前引《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238页。

⑤ 以下所引内容均见《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174—175页，不再一一注出。

府围攻西安前对蒋介石“行最后手段”，实际上就是杀掉蒋介石。对此应作何解读？有人认为，这只是周张二人准备在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并不能说明周恩来和张学良持有“除蒋”的立场。笔者对此不能苟同，认为周恩来在会谈中向张学良提议在情况紧急时对蒋介石“行最后手段”，实际上是再次重申了12日毛泽东和他本人向张学良提出的“紧急之时诛之为上”的建议，而张学良也表示同意。这种“杀蒋”的预案说明周张二人已在“除蒋”上达成某种共识。反观后来中共中央放弃“除蒋”打算后，无论预计事态会出现怎样的恶化，张学良和中共中央都没有再考虑过“除蒋”，这就从反面说明了17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并未放弃“除蒋”方针。

在庚部分，周恩来指出：“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有人认为，周恩来提出“保蒋安全”就意味着周恩来实际上放弃了此前中共的“除蒋”方针。在笔者看来，周恩来的提议主要是基于策略考虑，即以蒋介石的安全为筹码，阻止或延缓南京方面的讨伐，便于西安方面集中兵力布防，分化南京政府，并推动全国局势的发展，其“除蒋”设想并未真正改变。

在丙、丁、戊三部分，周恩来汇报了他与张学良商谈了应付南京政府军事“讨伐”的部署。在丙部分，周分析了南京方面与西安方面双方当时的军事态势和计划。在丁和戊部分，周汇报了他与张学良商定西安三方的军力调动和布防情况以及应敌计划。

在己部分，周恩来首先汇报蒋鼎文被放出，持蒋介石的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于右任明日来西安的情况，接着汇报了他与张学良商定与宋子文等进行谈判的5项条件。从“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和“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等内容来，隐然可见中共中央以西安为全国抗日中心这一设想的痕迹。

在辛部分，周恩来谈到西北三方联合情况。他首先评估张杨部队的现状，“东北军抗日情绪高，西北军杨亦有七八分把握”。接着，他说了自己第二天会见杨虎城的打算，并说明杨部冯钦哉动摇情况。最后，他谈到三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联合的打算和安排，“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成推动全国中坚”，“西北临时军委红军加入”。

在周恩来17日的电报中，我们丝毫看不出有任何“释蒋”和“拥蒋”的蛛丝马迹，相反，我们还能隐约看到中共中央的“除蒋”方针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这一设想的痕迹。要知道，“释蒋”和“拥蒋”都是对中共事变之初应对事变方案的重大调整，周恩来如果真的提出“释蒋”和“拥蒋”，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在向中共中央汇报中隐瞒不报。因此，我们可以不容置疑地断言，周恩来在12月17日并未提出“释蒋”和“拥蒋”。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之初在保安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他很了解当时中共中央对于事变的看法和对事变前途的分析，也非常明白中共中央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设想和“除蒋”方针，因此，周恩来在12月17日抵达西安后不会置中共中央的既定认识和决策于不顾而自作主张，他不可能当面向张学良指责“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可以说，周恩来对于事变性质和前途的认识以及在寻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上，与中共中央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作者叶扬兵，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